
工业化发达阶段的浙江经济发展

——浙江人均 GDP 突破 6000 美元后的经济发展

徐剑锋 项 枫

【摘要】2008 年,浙江人均 GDP 为 42214 元,按照国家公布的 2008 年平均汇率来换算为 6078 美元,标志着浙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对经济的发展升级至关重要,研究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对浙江实现跨越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浙江; 人均 GDP; 经济发展

一、人均 GDP6000 美元内涵与比较

因名义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两个不同国家或地区与不同两个时期的美元进行比较。这就要求对浙江人均 6000 美元进行概念确定,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

(一)购买力平价与国际间的经济水平比较

利用名义汇率对 GDP 进行国际比较因没有考虑物价差异,对各国经济水平的反映是不真实的。而购买力平价(PPP)科学地比较了各国的物价水平,因而这种比较方法更能体现各国商品服务的实际生产能力居民实际的生活水平。

2008 年 2 月底,世界银行公布了 146 个国家和地区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此次购买力平价项目以 2005 年的物价为基准,对美元与人民币及其他主要货币的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较为全面综合的比较,认为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评价为 1 美元相当于 3.45 元人民币,这一结论与美国中情局(3.76)等机构的研究结果接近,得到了全球普遍认可。故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作为依据。

由于 2006-2008 年美国与中国物价指数的变动差异。本文在 2005 年绝对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采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算法得出,2008 年底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应调整为 1:3.52。按此标准计算,2008 年浙江人均 GDP42214 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 11982 美元。

(二)通货膨胀率与不同年度的美元价值比较

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同年度美元的实际价值也在不断变动,这就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将不同时间的美元进行简单的比较。

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按复利进行计算,美国 1970 年 12 月到 2008 年 12 月的累计通货膨胀率为:428.21%。经换算可得出浙江 2008 年人均 GDP 的 11978 美元相当于 1970 年的 2269 美元。利用相同的办法,可以推算出主要年度浙江人均 GDP 的 2008 年美元价值。

作者简介:徐剑锋,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项枫,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25)

根据 N. 赛尔奎因以 1994 年人均 GNP 价格指数对经济发展阶段所作的划分:人均 GNP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为 450– 1090 美元;工业化初级阶段为 1090–2180 美元;工业化中期阶段 2180– 4370 美元;工业化高级阶段 4370– 8190 美元。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为 8190– 15120 美元;发达经济的高级阶段为 15120–22650 美元。浙江 2008 年人均 GDP 按 1994 年美元价格计算为 8532 美元/人 (PPP), 按赛尔奎因阶段划分法, 浙江刚进入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 (8190– 15120 美元/人)。

根据钱纳里(1989)的实证分析结果, 一个国家(地区)人均 GDP 超过 3360 美元后, 就进入了发达经济的阶段。2008 年浙江人均 GDP 达到 42214 人民币(相当于 1970 年美国的 2269 美元), 跨过了工业化成熟期 (1120– 2100 美元/人), 刚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业化发达期 (2100– 3360 美元/人) 门槛。

(三) 2008 年浙江经济水平与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与地区的购买力平价水平, 进行横向换算比较, 再根据美元的通货膨胀率进行时间转换, 可得:

日本: 1970 年人均 GDP 按当时的官方固定汇率计算为 1945 美元。但当时官方的日元汇率有所低估。日本从 1949 年直到 1971 年,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实行 360 日元/美元的固定汇率。1971 年 12 月, 西方十国财政部长通过“史密森协议”, 认为日元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应该是 315:1, 精确地要求日元升值 16.88%。根据这一比率进行调整, 1970 年按 PPP 计算日本的人均 GDP 应为 2223 美元/人。与浙江按 PPP 计算的 2269 美元/人 (1970 年美元价格) 基本相同。

韩国: 1989 年韩国按名义汇率计算人均 GDP 突破 6000 美元。1990 年韩国人均 GDP 为 6153 美元, 按 PPP 计算 (根据世界银行 ICP 标准, 再进行相对购买力平价换算), 应为 7411 美元/人, 而浙江 2008 年人均 GDP 按 1990 年美元价格计算为 7626 美元/人, 两者相当。

台湾: 1986 年按名义汇率计算, 台湾人均 GDP 为 4071 美元/人。台币对美元汇率存在着低估现象, 按世行 2008 年 2 月公布的 PPP 水平再按购买力平价进行回推计算, 1986 年台湾人均 GDP 应为 6538 美元/人, 浙江 2008 年人均 GDP 按 1986 年美元价格计算为 6298 美元/人, 两者较为接近。

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浙江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还不到美国 1970 年 (4950 美元/人) 的一半, 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 60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 但与 1971 年意大利的人均 GDP 水平相当。可见, 2008 年的浙江实际人均 GDP 水平与 1970 年的日本、1971 年的意大利、1986 年的台湾、1990 年的韩国、1991 年的阿根廷、1995 年的墨西哥相当。

二、相似国家与地区的相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

根据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 结合先发国家, 尤其是与浙江文化、地理、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变动较为相似的日本、韩国、台湾与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演变历程, 可以得出进入工业发达期经济将出现以下几个重大变化:

(一) 实际有效汇率的持续上升, 美元计价人均 GDP 加速提升

这一阶段, 随着工业化完成成熟阶段进入发达阶段, 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外汇储备会迅速积累, 本币汇率会出现持续上升势头, 以美元标价的人均 GDP 快速增加。在这一阶段的前几年往往就会出现汇率升值趋势, 并会延续数年甚至 20 年。即使汇率升值不大, 也会通过本币对内贬值 (高通货膨胀) 来达到实际汇率的快速升值。

1971 年前,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长期稳定在 360 日元/美元的水平上。1971 年 12 月, 西方十国财政部长通过“史密森协议”, 要求日元升值到 315 日元/美元, 从此日元走向温和升值。到 1985 年, 日元兑美元汇率平稳地升至 1:200, 12 年间年均升值 5.2%。

1985 年 9 月在西方七国逼迫下日元陷入飙升阶段, 1990 年升至 145 日元, 1995 年曾一度升破 90 日元。日元的快速升值, 使得日本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快速提升, 1975- 1980 年, 日本以美元计价的名义人均 GDP 迅速从 5000 美元超越 10000 美元, 只用了 5 年。

再看台湾, 1983 年新台币对美元汇率还处于 40. 27:1 的水平线上, 其后台币逐步趋向升值, 至 1986 年提高到 35. 50:1, 翌年又急攀至 28. 55:1 的高度, 至 1992 年创下 25. 40:1 的新高点。短短几年时间, 新台币与美元汇率从 40 元快速上升至 25 元, 提高 36. 9%。1983 年, 台湾人均 GDP 为 2880 美元/人, 1986 年升至 4071 美元/人, 1987 年突破 5000 美元, 1992 年跃升至 10822 美元/人, 从 1986 年到 1992 年, 短短 6 年间, 台湾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增加了 165. 83%。

而韩国从 1990 年到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前, 汇率基本稳定, 但其年均通货膨胀率基本上保持在 5%以上, 远高于同期美国水平, 造成实际汇率的升值, 使得换算成美元的人均 GDP 迅速增加。1990 年韩国人均 GDP 为 6153 美元/人, 到 1996 年达到了 12282 美元/人, 6 年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翻了一番。

墨西哥在这一阶段也类似, 1995- 1999 年的年通货膨胀在 16- 35%之间, 汇率也出现较大幅度贬值。2000- 2004 年的年通货膨胀率也在 4. 4- 9. 5%, 远高于同期美国。由于通胀率大于汇率贬值幅度, 墨西哥比索的实际有效汇率仍明显升值, 尽管期间墨西哥经济增长不快, 但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仍出现了较快增长。1995 年墨西哥人均 GDP 为 3117 美元/人, 1999 上升到 4884 美元/人, 2007 年达 8346 美元/人, 12 年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增长 167. 76%。

意大利也类似。1971 年意大利人均 GDP 按市场汇率计算为 3171 美元/人, 1975 年达 5261 美元/人, 1986 年达 10901 美元/人。法国在 70 年代初也如此, 借助于法币对美元的迅速升值, 从 1970 至 1974 年, 法国人均 GDP 从 2862 美元/人升至 5261 美元/人, 4 年间增长 84%。从 1974 到 1979 年的 6 年时间, 法国又实现了美元人均 GDP 从 5000 美元/人到 10000 美元/人的飞跃。

(二) 经济增长由投资带动转向消费驱动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投资带动”转向“消费驱动”转变。

在工业化成熟阶段以前, “投资”是推动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或后期阶段以后, 居民消费快速扩张, 服务业与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迅速崛起, “消费需求”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在这一阶段都出现了这一变化特征: 消费需求快速扩张, 并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1970 年, 美国消费率为 81. 9%, 超过投资率 64. 3 个百分点; 法国的消费率为 72. 7%, 超过投资率 45. 8 个百分点; 德国的消费率为 70. 4%, 超过投资率 45. 2 个百分点。

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资本积累占 GNP 比重始终在 30%以上, 1956- 1973 年, 日本居民消费增加 4. 4 倍, 而国内积累增加了 11. 1 倍。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初, 资本积累率高达 37. 3%(同期德国为 27%、英国 19%)。可见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自国内资本的积累与投资增长。从 1973- 1978 年, 日本居民消费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势头。个人消费在 GNP 中的比重由 50. 9% 上升至 53. 6%。而资本积累率降为 25- 30%。

从台湾的增长结构看, 也基本类似。1983- 1987 年间, 台湾经济的高度扩张源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岛内劳动力投入量平均每年递增 3. 2%; 资本投入量平均每年递增 7. 9%。1986 年台湾储蓄率最高时一度达 38. 5%, 此后开始下降, 而消费比重不断攀升。2002 年, 国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87 年的 61%提高到 76. 2%, 上升 15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消费比重同期从 46. 7%提高到 63. 7%。

(三) 经济增速下降, 进入中速增长时期

进入工业化发达期后,虽然以美元计价的名义人均GDP快速增加,居民与企业的金融资产膨胀,但实际经济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多数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阶段后告别了经济高速增长期,而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日本在1955-197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8.35%,1971-1981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降为4.7%,不及1960-1970年间的一半。1980-1987年,经济增长率更降至3.8%。1989年后,日本经济更是进入零增长状态,而且持续了12年之久。同样,1955-1970年间德国年经济均增长率曾达8.11%,1970-1981降至2.5%;法国也由1955-1970的5.31%降至1970-1977的2.63%。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主要源自工业生产增长率的减缓,1970年以前,日本经济依靠工业的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1951-1960年,日本的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6.7%,1961-1970年降至13.6%,1971-1977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6%。与日本类似,1951-1960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9.5%,其后两个阶段则降至5.8%与2.2%。

再观察与浙江经济环境极为相似的台湾。台湾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60-70年代年均增长率接近10%),1983-1987年间的增长仍高达10.4%。1988年后,台湾经济增长率降至个位数,90年代基本上徘徊于4-8%之间。

(四)虚拟资产急剧膨胀,泡沫经济显现与破灭

这一阶段由于财富的大量积累与本币汇率大幅升值,财富的爆炸性增加,导致大量资金追逐炒作,虚拟经济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股市、楼市、收藏品市场出现泡沫。虽然虚拟经济的繁荣也会带动部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其造成的危害更大,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离出,热衷于短期炒作。虚拟经济膨胀又带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居民生活成本,并促进人工成本上升。从而削弱了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日本自70年初走上日元升值道路,直到90年代中期,期间持续了20多年。造成日本的虚拟资产价格持续膨胀。1980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较1968年增长了5倍(年均上涨15%),1989年一度升至近40000日元的高点,较1968年增长28.8倍,日本股市整整繁荣了20年。同样,日本的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东京等地房地产价格贵如黄金,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1989-1990年,日本央行大幅度加息以应对泡沫经济,股价从1990年初开始大跌,日经指数与最高点相比下跌了63%,房价的跌势与之相比并不逊色。日本经济也进入持续低迷,日本经济长期一蹶不振。

台湾1986年台湾股市综合加权指数首次超过1000点,1990年1月,股市创出了12495点。以1986年为基点,台湾地区股市综合指数两年内上升5倍,4年内上升12倍,成为全球股市的神话。不幸的是,随着台币汇率升值趋缓与经济增长率下滑,国际游资大量撤回,1990年年中台湾股市开始大幅回落,到1990年10月,股市崩盘式地回落到2485点。与此同时,台湾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80年代后期,地价在短短几年时间上涨2-3倍,且供不应求,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生产厂商的投资意愿,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韩国自90年代初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也有着类似的经历。股市泡沫与房地产价格膨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韩圆大贬值下,迅速破灭。

(五)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从日本、台湾与韩国的发展经历也可以验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日本等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产业结构也持续高级化趋势。最明显的特点在于第三产业比值稳步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经过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期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后,日本服务业上升速度明显超过二产。在第三产业内部,以房地产、金融、市场中介服务等为支柱的服务业,和以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等为内核的创意产业,快速发展起来。

同样,亚洲“四小龙”在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之后,第三产业得到较快增长,三次产业比重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三次的内部结构也出现了重大调整。以台湾地区为例,1986年台湾第二产业比值达到历史最高点。1987年后,其比值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比值持续上升。到1996年,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3.2:35.7:61.1,10年期间第三产业比值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以金融、保险及工商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明显快于传统服务业的增长。

(六)工业内部结构不断升级

这一阶段,制造业内部的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变动。一是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二是从要素结构看,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替代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工业主导行业。

1955年后近20年里,日本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它通过确立贸易立国、赶超欧美为战略目标,实现了以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的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1970年,重化工业超过轻工业;1978年为37.5:62.5。作为轻工业的典型代表纺织行业,1950年占日本制造业净产值的比重为18.1%,1970年降至5.5%,1977年为4.1%;而作为重工业的代表性行业机械工业,1950年在制造业净产值中的比重为16%,1970年升至33.9%,1977年达36.2%。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严重冲击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发布《70年代展望》,提出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设想,把电子计算机、宇航等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型”、“加工技术选择型”的方向发展。在重工业领域,有色金属、钢铁、化学产业的地位让位于医药、运输机械和精密机械等产业。

台湾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台湾经济是从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并起飞的,70年代随着岛内劳动成本的逐步升高,又转向发展以石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80年代中后期则转向了以电子资讯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型产业。80年代中期,台湾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加工业发展达到峰顶后,开始转入衰退状态。与此同时,电子、化学等工业则得到了较快发展。在1987-2002年间,台湾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增长141%,其中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基本金属业与石油业得到较快增长,其他制造行业增长幅度有限。

韩国伴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内部结构变化迅速。1974年韩国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1978年重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轻工业。时间比欧美发达国家缩短了一半左右。1990年,刚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的韩国的主导产业已经由电子计算机等IT产业担当,而进入21世纪后,其知识技术型产业的地位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七)对外直接投资大发展,制造业外移趋势明显

根据邓宁的投资周期理论,随着人均GDP的发展,一国或地区的FDI的规模会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吸引外资会有长足发展,而对外投资会迅速增加。当人均GDP达到4750美元以后,会成为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的经济体。

1965年前,日本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仅为9.5亿美元,1966-1970年间对外投资金额增至26.3亿美元。1970年以后,日本以综合商社等大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投资迅速增加。1971-1975年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23.6亿美元。1976-1982年累计投资金额达到372.1亿美元,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元的持续升值与国内金融资产的膨胀,大量日本资金从制造业流出,投入美国等地从事短期投资。1983年,日本对外投资金额达到84.45亿美元,其中31.5%分布在美国。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75亿美元,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荷兰等国的对外投资大国。

以1986年为标志,进入工业发达阶段后的台湾对外投资大量增加。1986年,经“经济部投审会”核准的对外投资金额为5700万美元,1987年后对外投资出现倍增之势。1952-1986年台湾对外投资累计金额只有2.3亿美元,1987-1991年,台商累计对外投资达44.61亿美元。实际上,中小企业未经“投审会”的对外投资额10倍于官方统计数字。韩国也类似。

对外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发达期初期,由于开始转移的多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与传统工业,对产业结构提升反而有利,通过三产的迅速发展与新兴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体经济高速发展,如台湾的 90 年代前期,日本的 80 年代中期前。但其后制造业的不断外移,经济空心问题必然产生,并影响到三产发展的基础。日本 90 年代的停滞以及台湾 2000 年后的经济滞缓就与其有很大关系。

(八)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与阶层差距容易拉大,社会问题突显

这一阶段进入工业发达期后,经济增长下降、资本外移。对外投资使资本所有者更能享有更高的资本投资得利,但却不利于劳动要素。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阶层差距相对很小的台湾,在 90 年代后期差距就不断拉大。同时,产业不断由环境不利的地区向信息技术人才集聚的都市区的转移,引起地区间差距扩大,如汉城都市圈与韩国其他地区的差距拉大,台北区与台湾南部地区差距扩大等。另外农业不断萎缩,都市服务业优先发展,城乡差距也不断拉大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政策,就可能引发重大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经济发展。期间的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 70-80 年代在这方面就付出了惨痛的教训。

三、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的浙江未来走势

2008 年,浙江人均 GDP 达到 6078 美元,标志着浙江进入了钱纳里所称的工业化发达阶段,霍夫曼工业化的第四阶段,以及邓宁所实证的对外投资第三阶段。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以及对环境相类似的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的总结,结合浙江的基础与未来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在这一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会有以下几大趋势:

(一)浙江 GDP 增长率会有所下降,经济发展将进入中速偏高阶段

这是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经历。进入这一阶段后,经济增长率将从 10%左右或更高,回落至 4-8%的增长速度。但由于浙江为一个省区,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发展水平低于浙江,浙江可利用国内市场与资源,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同时,长期以来,投资在浙江经济增长中占据首要位置,而目前及未来多年内,通过政府引导与刺激,未来多年内的投资仍可保持在 10%以上的增长水平,从而对浙江经济增长起到“保稳”作用。另一方面,浙江制造业尚有一定的增长后劲,第三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正常环境下,8%的年均增长速度还可望维持 10 年左右。

(二)以美元计价的名义人均 GDP 将在 2013 年左右突破 10000 美元,并在 2020 年左右达到 20000 美元左右

这一速度与类似时期的日本与韩国、台湾的变化相比也不高。这是基于进入工业化成熟期与发达期,本币对美元汇率将持续上涨,同时通货膨胀率会相对高于美国这一基础上进行预测。谨慎预测,未来 10 年内浙江人均 GDP 实际增长率将可以保持在 8%左右,年均通货膨胀率在 3%左右,每年 GDP 名义增长速度可达 11%左右,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守的估计每年升值上升幅度将达 2%左右,期间浙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 1.2%。这样,浙江在 2013 年,人均 GDP 将突破 10000 美元,达到 10600 美元左右。到 2020 年或稍早时间,超过 20000 美元/人。

(三)产业结构会趋于和谐,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滞后与轻重工业比例超前的现象会淡化

早在 2003 年,浙江重化工业产值就超过了轻工业,以霍夫曼工业化阶段来衡量,浙江在 2003 年就已进入工业化最高阶段(第四阶段)。在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这一阶段的第三产业比值早已超过第二产业。但直到 2008 年,浙江的第二产业比值高达 53.9%,较第三产业比值高出近 13 个百分点。说明了浙江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严重滞后的现象。从发展趋势看,在多年内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冲击以及提升消费需求结构的环境下,以城市经济为载体的服务业将取得较快发展,而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会趋于下降,三产结构的变化速度无疑会加快,第三产业比值与第二产业比值曲线的交叉点很可能在 3-5 年内很快到来。

(四)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与投资共同主导推动

进入这一阶段,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是共同的变化规律,浙江也不例外。浙江居民的高储蓄率为消费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会加快这一趋势的带来。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外投资净收益的增加等,都将强化这一趋势。

(五)对外直接投资会有大发展,提前进入邓宁投资周期理论的第四阶段

如前述,目前浙江对外投资仍处于第三阶段后期。但由于浙江为一省区,区际投资没有市场分割、汇率风险、投资壁垒、文化差异等因素的限制,对省外投资会早于对海外投资出现。实际上,90年代末以来,浙商对省外投资就已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是大陆对省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对省外投资额远高于吸引省外来浙投资额,国内 NOI 早为正值。近年来,浙商对海外投资也高速增长,对海外投资金额仅次于北京。据省外外贸厅有关调查显示,浙商对海外投资审批登记的仅为实际对外投资额的 10%(与台湾 80 年代末以后的情况极为相似)。因而,可以估算近年来浙江年对外投资(包括省外与海外)应在 150 亿美元以上,多于浙江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趋势随着经济发展仍会强化。

(六)产业组织变化加快,大企业的主导作用上升,小企业的生存艰难

从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工业化推进,企业规模结构将趋于稳定。1967-1977 年,日本制造业的大企业(300 人以上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占比维持在 0.6%,产值比重从 49.2%升至 56.6%,此后基本稳定。从韩国的企业结构看,90 年代中小企业的产值比重大致稳定在 50%左右。即使是大企业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台湾,2002 年中小企业的产值比重不到 50%。而前 50 大集团总收入占台湾 GDP 的 71%。

而 2007 年浙江制造业中,中小企业的产值比重高达 80%,中小企业家数所占比重大达 99.98%,就业比重占 95%以上,即使是占比最低的出口贸易,中小企业也占到近 50%,远高于日本、台湾与韩国。从未来趋势看,浙江中小企业在产值比重、利润比重上将会趋于下降,小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而大企业集团的地位会有明显上升,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依附性会有所加强。

四、进入发达阶段的问题与有关对策建议

浙江应从先发国家与其他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中吸收经验教训:

(一)制订技术长期规划,推进技术产业化

从先发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看,如果不保持较高的制造业规模,会造成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并影响整体经济基础。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的优级化,就会造成传统产业衰退而新兴产业难以为续。按照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的划分,工业化发达阶段,也是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时期,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可以说,加大技术研发,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2008 年浙江跨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同样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近年来,浙江政府与企业界开始重视创新发展,并提出了“创新强省”战略。我省研发经费支出比重仍偏低,企业普遍存在轻研发重仿制的现象。2007 年,浙江研发经支出占 GDP 比重仅为 1.52%,离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目标(2%以上)还有较大差距,不仅远低于韩国、台湾,也低于江苏(1.67%)、上海(2.52%),发明专利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更少。未来阶段,如何将创新强省这一战略付诸实施,促使更多的企业主动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建议我省在尽快制定出台中长期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参照日本《70年代展望: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构想》(70年代初)、韩国《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1990年)与台湾《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程计划(1986-1995)》(1986年),拟定具体的中长期技术产业发展目标与战略步骤。同时制定具体的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引导社会尤其是企业界重视技术研发,促进技术与产业结合。在制定政策中,要注重吸收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如90年代日本策略性产业选择的失误),注重战略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二) 讲究开放策略, 加强对 FDI 的规范与引导

开放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的竞争力, 促进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提高。但如果开放的策略、步骤掌握不当, 就可能未受其利、先蒙其害。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开放的重要性。同样, 日本、拉美等经济体在开放过程中也有着一些沉痛的教训。

日本与韩国从工业化初期阶段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在建立轻工业基础后, 推进重化工业革命, 限制外来直接投资, 注重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同时, 鼓励本土企业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成本较低的资金, 大量引进技术。台湾的发展阶段大多类似, 但在对待外来直接投资的态度上, 台湾远为积极。

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则有沉痛的教训。拉美多数国家都经历了70年代以前由外来企业控制重要行业, 70年代后期国有化兴起并驱逐、限制外资, 而通过对外举债来推进发展。但由于大量债务被用于基础设施等非生产性项目投入, 及对外资规模与结构管理不当, 结果在80年代美元汇率高企、利率攀升的环境下, 陷入国际债务危机, 造成80年代经济的停滞不前。比如, 阿根廷1980年人均GDP已达到5665美元, 此后发展遇到困难, 到2004年, 反而降为3650美元。墨西哥、巴西等国也类似。

另一方面,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 对外直接投资多呈快速增加, 这些投资提高了资本收益, 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对外投资的过快发展也会导致产业外移与经济空心化。80年代前的日本企业依据比较优势模式, 推进衰退产业的对外投资, 促进了国际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 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与本国产业转型升级, 这种模式被誉为小岛清模式。而美国的垄断优势对外投资模式, 强调绝对领先的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 结果造成先进技术过快扩散, 对外投资形成回镖效应, 对外贸易逆差增加, 产业竞争力下降。同样, 90年代台湾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制造业大量转移, 而本土企业缺乏核心技术, 产业结构难以升级, 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

浙江在对外开放中, 也要吸收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 根据浙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环境, 制定科学的开放策略与步骤。一是继续加强引进省外与海外资本, 但要有选择性地引进, 主要挑选技术含量高的, 产业联带效应大的项目进入。同时要关注产业安全, 防止外来资本对本土民营企业的排斥, 注重公平竞争, 消除对本土企业的政策歧视。二是在国家金融政策允许的条件下, 适当利用国际资金来引进技术与人才, 同时防范国际热钱与省外热钱到浙江炒楼炒地炒股。避免过度的、全方位的金融开放。三要适当限制浙商对省外与海外投资的盲目发展, 借鉴小岛清模式, 引导浙商依据相对优势模式进行投资布局, 防止产业过快转移与制造业的空心化。

(三) 引导省内消费增长, 重视国内市场拓展

1996年, 浙江进出口贸易超过省际贸易, 浙江经济大规模由内转外。形成了从省外进口大量原材料或半成品再加工生产出口的三角贸易格局。这种格局下, 浙江在省际贸易中出现了大量逆差, 而在国际贸易中积累了大量顺差。与此同时, 浙江不少企业开始忽略了国内市场开发, 忽略了产品品牌提升。一味以低价竞争来赢得国际市场, 也使浙江成为我国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地区。随着环境的变化, 依靠海外市场的三角贸易将难以为续,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浙江出口的冲击突出地表明了降低出口依存度的重要性。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浙江居民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 社会游资充裕, 但大量的民间资金没有投入实业, 也没有转变成消费增量来带动经济发展, 而是在全国各地游走, 从事短线投资。如何促进居民消费, 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 引导浙商提升品牌, 开发

国内中高端市场,带动民间资本创业投资,这对浙江经济发展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

浙江在推进消费需求时,要避免一些国家的错误。日本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期望确立的“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目标,来避免经济滑落,但策略上发生错误,它没有通过提高员工工资、提高大众消费购买力来进行,而是像以往那样采取了“支持生产者”的政策,企业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推动内需增长。目前阶段浙江在为企业帮扶解困时,绝不能以牺牲员工福利来维持企业运转,否则会抑制内需增长。

(四)关注本币升值影响,保持汇率基本稳定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本币往往会加速升值。这是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同时,它能降低进口资源成本、提升居民福利。如果在一定幅度内上升,也能促进企业提升商品品质、调整生产结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如果汇率升值速度过快或幅度过大,企业难以承受,必然会殃及经济发展。日本自 1971 年底至 1985 年的 12 年间,日元对美元每年升值 5.2%,升值幅度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反而促进了日本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品牌战略,优化了产业结构,日本对外贸易反而出现了巨额的顺差。1985 年后日元急剧升值,日元出现明显高估,结果日本的一般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减,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上升制造业开始不断外移,日本经济出现空心化现象。

台币在 80 年代后期的大幅升值也影响了台湾制造业的稳定发展。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到 2008 年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 20%,基本上能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企业能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品质、增加产品附加值,维持了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源品大幅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从而使浙江出口贸易能保持在年均 20%以上的增幅。从未来看,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以及人民币的事实低估,人民币升值仍是不可避免。但控制升值幅度与速度,以及最终稳定汇率的适当低估,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人民币升值中,应辅之以税收手段,如多次小幅度调低企业反应强烈的增值税,以减轻本币升值的成本压力,也是可行的策略。

(五)重视企业集群的蜕变,推进产业组织优化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马太效应明显,企业不断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更弱。这一阶段也是大企业迅速崛起的阶段,但同时也是大量小企业经常性破产的阶段。企业实力的壮大、跨国公司的崛起是工业化发达阶段的突出特征。这一时期,企业规模持续扩大,大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并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企业实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跨国公司迅速崛起与壮大,成为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了其经济繁荣与人均 GDP 的跨越式提升。

目前浙江已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一些大中企业将乘势发展成全国性的大企业,甚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但也会有不少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浙江不少小企业集群或块状经济将趋于衰败。企业间的竞争力差距、规模差距、效益差距会越来越大。

大企业的崛起将会改变浙江的企业结构乃至产业组织结构,能促进浙江企业的规模效益形成,推进浙江技术创新与品牌提升,改变目前企业间竞争过度的现象,使企业从价格竞争走向差异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不少小企业的消亡会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会拉大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与企业差距,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未雨绸缪,促进产业组织优化。

浙江产业组织的优化,应以产业竞争力提升为目标,要使浙江产业能在基本保持现有的产业集群外部效益的前提下,同时取得规模效益。其关键在于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通过资本联系(控股参股)、合资合作、战略联盟、关联交易、市场协调、产品外包,形成稳定的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网络,与中心卫星体系。

在此过程中,政府主要通过行业商会协会与企业沟通协调,避免对企业的过多干预。不宜经常性地以行政手段给以大企业差别性的优惠与扶持;在国家相关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寻求地方立法以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如在政府采购中留出相当份额给予中小企业,惩治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权益侵犯等);在目前环境下不宜过多强调创业。政府的工作重心应走向推进技术创新、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法制、扩大就业、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等方面。

(六)加快城市化,重点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发展

城市化对工业化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2008年浙江的城市化仍只有55.6%,而1985年台湾的城市化率已达76%,2000年达到83.5%;199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达83%,1995年为90%。浙江目前的城市化率仅相当于韩国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

未来一段时间浙江应在目前的工业化基础上,大力促进城市化发展。在发展城市化中,应吸收台湾与韩国的经验教训,要促进城市结构的合理化;由小城市到大城市、由南到北,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城市化与引进投资、引进产业、引进技术与引进人才相结合。

在当前阶段,宜重点推进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杭州、宁波、温州已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但台州、绍兴、金华、嘉兴、湖州、丽水等还没有形成区域中心城市,要通过市场主导、政策放权、制度创新、资金扶持、交通先行,推进这些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并结合强县战略与强镇战略,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

参考文献:

- ①竹内宏:《现代日本经济发展史》,中信出版社,1993年。
- ②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 ③李国振编:《美德日苏经济发展比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
- ④张仁寿、徐剑锋等:《浙江与韩国:经济发展及比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⑤何保山:《1860—1970台湾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 ⑥程极明主编:《亚太地区经济环境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开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 ⑦赵伟:《浙江经济人均6000美元的深层涵义》,《浙江经济》2009年第6期。
- ⑧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